

国际政治科学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二〇〇六年第三期（总第七期）

- 向钢华 王永县 偏好、信息与威慑博弈
- 王莉欢 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 阎 梁 人均GDP指标的误用
- 潘成鑫 新保守主义与伊战后的中美关系
- 李 巍 王 勇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科学. 总第7期/阎学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301-11130-4

I. 国… II. 阎… III. 国际政治-丛刊 IV. 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168号

书 名: 国际政治科学(总第7期)

著作责任者: 阎学通 主编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130-4/D·15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9.75印张 149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国际政治科学

2006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 邝云峰 (Yuen Foong Khong, 牛津大学)
文正仁 (延世大学)
布 赞 (Barry Buzan, 伦敦经济学院)
田中明彦(东京大学)
托 (William Tow,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哈佛大学)
约 菲 (Ellis Joffe,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张睿壮 (南开大学)
阿查亚 (Amitav Acharya, 南洋理工大学)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秦亚青 (外交学院)
埃文斯 (Paul Evans,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贾庆国 (北京大学)
萨 尼 (Varun Sahni, 尼赫鲁大学)
阎学通 (清华大学)
彭佩尔 (T. J. Pempl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编委会:

- 主 编: 阎学通
执行主编: 陈 琪
组稿编辑: 孙学峰
评审编辑: 周方银
文字编辑: 张盈盈
-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新斋 246 室

邮政编码: 100084

电 话: 010-62788801 010-62786457

传 真: 010-62773173

电子信箱: CJIP@mail.tsinghua.edu.cn

作者简介

向钢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1985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威慑、军事决策与博弈分析。

电子邮箱:xianggh.03@em.tsinghua.edu.cn

王永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66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业企业电气化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决策理论与管理决策优化。著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2000年)、《运筹学》(1993年)。

电子邮箱:wangyx@em.tsinghua.edu.cn

王莉欢 1986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新加坡政府任职。

电子邮件:laifoonwong@pacific.net.sg

阎梁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1995和2001年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

电子信箱:yanliang05@mails.tsinghua.edu.cn

潘成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讲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为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安全。论文曾发表在 *Alternatives*、*Political Science* 等学术刊物上。专著 *Underst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将由英国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出版。

电子信箱:chengxin.pan@deakin.edu.au

李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

电子信箱:kindyleeway@gmail.com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0和199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政治、中美经贸关系。著有:《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年)、《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1998年)。

电子信箱:yowang@pku.edu.cn

编者的话

冷战结束以来,威慑理论研究特别是威慑逻辑研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在威慑?在什么情况下威慑能够成功?威慑者的实力、决心与信息传递是如何起作用的?向钢华和王永县的论文《偏好、信息与威慑博弈》试图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论文比较了威慑逻辑的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选择分析和博弈论分析三种分析框架,提出了威慑格局概念与完全信息条件下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指出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承诺行动只有昂贵信号才起作用。文章区分了不同类型威慑者以及不同类型的威慑信号,建立了基于信号博弈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威慑模型,求解了模型的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指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威慑信息传递并不总是有效,它只在分离信号等部分情形中起作用。文章通过对海湾战争、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和马岛危机等案例分析,对博弈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相关的现实问题做出了解释。

王莉欢的《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为何快于日本—东盟关系的发展?作者发现,美苏两极格局的消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东盟政治关系能在1996年赶上日本—东盟政治关系。但是,结构性原因不能对中国—东盟关系自90年代末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日本—东盟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做出比较完整的解释。作者认为,中国和东盟区域化政策一致,而日本和东盟区域化政策不一致是导致这一时期中、日与东盟关系发展一快一慢的重要原因。1997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接近使得中国—东盟关系快速扩展并得以深化。中国选择与东盟一致的区域化政策主要源自战略考虑,力图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同时不愿看到危机后的东盟继续弱化,失去其独立自主能力而最终倒向美国。日本的区域化政策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日本奉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外战略,无法在美国和东亚(或亚洲)之间做出选择。东盟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希望把东南亚经济整合到东北亚经济中去,防止东盟边缘化。

人均GDP是衡量人均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不过,这一指标被人们用来解释或标志广泛的非经济现象。人们对人均GDP指标的使用是否经常超出了它的适

用范围?人们超范围使用人均GDP指标的情况是如何出现的?阎梁的《人均GDP指标的误用》讨论了国内在外交、政治、军事、社会、科技等领域存在的广泛使用人均GDP指标的情况,认为对人均GDP指标存在着许多误用。论文解释了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受经济决定论和人口负担论的综合影响,人均GDP指标在中国受到重视。由于存在片面的理解,人均GDP与很多领域的具体问题建立起了牢固的“联结”。这些“联结”在社会学习原理和认知原理的作用下不断再现和扩张,由此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人均GDP社会认知图式”。在该图式支配下,国内近几年来形成了不分场合、不分条件地使用人均GDP指标的社会心理倾向。作者进而分析了误用人均GDP的原因及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作用,并认为这些负面作用已经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得到部分纠正。

潘成鑫的《新保守主义与伊战后的中美关系》一文力图揭示新保守主义对中美关系的政策意义。新保守主义是当前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也是布什主义外交政策的政治哲学基底。新保守主义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并在国外扩展民主与自由,即以现实主义手段来达到自由主义的目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对美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的主要对手之一;美国不能因为从事反恐战争而忘记中国的崛起。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威胁,新保守主义者主张美国采取三管齐下的政策:构建包围圈、做好对华军事准备和大力支持“台独”。作者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将持续存在,并有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加剧中美之间的相互敌对,甚至引发两国冲突。

李巍、王勇的评论文章《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讨论了国际关系学者从单元层次来建构理论的最新努力。作者认为,第三次大辩论之后,追求简约的体系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范式,并使国际关系理论在科学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关系学学者对单元层次的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无论是现实主义阵营还是自由主义阵营,都开始试图回归国际关系学的单元研究传统,并尝试打开国家“黑匣子”,从国内层次寻找影响国家对外行为和国际秩序的根源。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国内互动的角度研究全球政治经济问题,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的回落,并努力建构新的融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世界政治理论。不过,由于单元层次变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单元理论与体系理论融合的内在困难,至今国际关系学术界还没有找到构建世界政治理论的合适路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刊在国际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经与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本刊英文版第1期于2006年8月25日在英国正式出版,欲了解英文版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www.oxfordjournals.org/our_journals/cjip/,可免费浏览第1期内容。在此,编者再次衷心欢迎专家学者赐稿。

征稿启事

《国际政治科学》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主要刊登国际安全、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学领域的论文,尤其重视与中国对外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欢迎其他相关领域的稿件。

《国际政治科学》倡导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但是特别欢迎包括问题提出、文献回顾、逻辑推论和经验检验等研究程序完整的学术论文,同时适当刊出学术性较强的评论文章和书评。

投稿使用中英文均可,稿件一旦采用本刊负责相应的翻译工作,但本刊拒绝一稿多投,请作者多加注意。来稿字数最好控制在1.5—2.5万汉字或者1—1.25万英文单词之间(不包括注释),并注意编写方法规范。具体要求可参考注释体例。此外,投稿时请作者提供250—300字的内容摘要和200字左右的作者简介(包括教育背景、所在单位、主要学术成果及联系方式,包括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传真、通信地址等)。

本刊实行同行匿名评审制度。收到稿件后,编辑部将约请相关问题领域的三名专家对稿件进行匿名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于收到稿件的两个月内通知作者是否采用。如果采用,编辑部将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

来稿请将电子版寄至CJIP@mail.tsinghua.edu.cn;也可将打印稿寄至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新斋246室《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邮编:10008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 合作推出《国际政治科学》英文版

2006年8月25日,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正式推出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 创刊号。CJIP 是《国际政治科学》的英文版,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该刊的组稿和编辑。《国际政治科学》中文版于2005年3月创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代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2006年和2007年CJIP将各出两期,2008年开始为季刊(即出四期)。

CJIP 的推出,为国际政治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也是中国学者向国际同行展示研究成果的窗口。CJIP 旨在推动对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力求以中国人的独特视角来分析国际问题。CJIP 主要发表理论、历史及政策导向的研究成果,涵盖东亚地区的热点事件、军控和裁军、武装冲突和争端解决、全球化及国内变革、国际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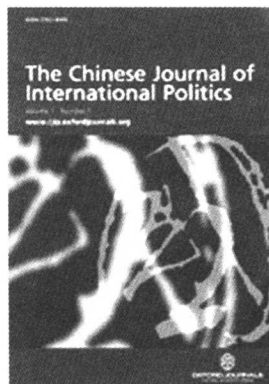
CJIP 的出版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慷慨赞助。麦克阿瑟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捐助学术研究的机构之一。CJIP 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目标:加强科学和安全专家团体,促进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探讨,支持国际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

牛津大学出版社期刊总经理马丁·理查森认为:“鉴于《国际政治科学》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洞察力以及它对高水平学术研究方法的促进,我们迫切感到需要推出该期刊的英文版本。”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而言,传播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最大的目标。我们很高兴与北大社及清华国际问题研究所合作,使这份期刊面向更多的读者。”

读者可以登录 <http://www.cjip.oxfordjournals.org>,并免费阅读第1期。

期望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对 CJIP 的赐稿。纸质投稿请寄至:清华大学新斋246室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邮编100084);电子版本请寄至:CJIP@mail.tsinghua.edu.cn。



新书书讯

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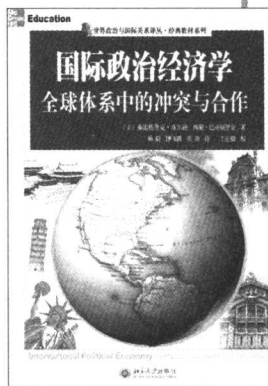
[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 著

16开 666页 2006出版 定价:66.00元

ISBN 7-301-10666-1/D·1488

不断增强的一体化和世界市场的扩展所带来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趋势,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利益集团、各国决策者和学术界对全球化这一现象褒贬不一。这些问题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也为我们审视诸如跨国公司、发展政策、不平等与依附的现状以及非正规经济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人生存的全球经济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材,它介绍了现代国际经济体系的演变与主要特征,以及当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以求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当前的社会政治现状及新世纪的美好蓝图结合起来,寻求它们的关联性。

弗雷德里克·皮尔逊,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教授。西蒙·巴亚斯里安,美国克拉克大学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王逸舟 主编 袁正清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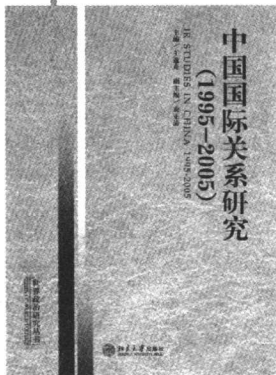
16开 560页 2006出版 定价:68.00元

ISBN 7-301-10969-5/D·1546

这是一本全面介绍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成长历程和研究现状的著作。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的长编绪论,对这一学科近十年发展的历史、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独到的阐述。来自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二十位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别评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各个主要分支及重大专题的研究进展,从不同侧面生动展示了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势头,同时细致梳理各自领域的缺失及其原因。全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分析力度,第一次全景式地呈现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当代发展的立体影像。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

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书书讯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

王缉思 著

16开 404页 2006出版 定价: 42.00元

ISBN 7-301-10885-0/D·1530

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研究国际政治的部分学术成果 and 心得,全书分“理论思考”、“战略分析”和“读书拾零”三部分,内容涉及战争与和平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民族与民族主义、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等等。所收部分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产生过广泛影响。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兼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王正毅 著

16开 300页 2006出版 定价: 32.00元

ISBN 7-301-11062-6/D·1570

本书精选了作者十年来的代表性论文,包括对社会科学知识谱系富有创建性的思考,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与方法独特的探索,反对传统的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思维上的“二分法”,提出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进行分析的精辟见解,以及应用“历史社会科学”方法和“理性主义”方法对世界经济与历史体系、东亚国际体系与亚洲区域化、中国的转型、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等具体问题领域进行实证性研究。

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

郭树勇 著

16开 260页 2006出版 定价: 26.00元

ISBN 7-301-10840-0/D·1520

本书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新理论与新视角,以国家成长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合秩序性发展、合法性战争和 大国形象为研究变量,重新解读三十年战争以来法国、英国、俄国、美国等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历史规律,对保罗·肯尼迪观察大国兴衰的方法与结论进行超越,对约瑟夫·奈最近的软实力理论加以补充,提出了大国成长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的命题。本书对软实力、大国形象、德日崛起反差、美国成长之谜等焦点问题都有独特而详细的阐述,并对成长中大国的战略谋划有所建言,是国内第一部用

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大国崛起战略的学术专著。

郭树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副教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际政治科学

2006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目 录

II	作者简介		
III	编者的话		
1	偏好、信息与威慑博弈	向钢华	王永县
34	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王莉欢
65	人均 GDP 指标的误用		阎 梁
91	新保守主义与伊战后的中美关系		潘成鑫
	学术评论		
112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	李 巍	王 勇
143	注释体例		

偏好、信息与威慑博弈*

向钢华 王永县

威慑理论是一种在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安全理论,曾被誉为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术创造之一。^①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倡导的博弈论方法、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倡导的心理分析方法和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倡导的个案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威慑理论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② 在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常规威慑日益受到重视,统计检验方法也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威慑理论研究中。由于威慑具有行为者数量有限、行为者之间策略互动明显以及所涉及的利益重大等特点,因而有学者认为威慑等国际安全问题比较适合用博弈论研究方法。^③

* 作者非常感谢匿名评阅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义。

① Christopher Achen and Duncan Snidal, "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2, January 1989, p. 143.

② 克雷格·A. 斯奈德等编:《当代安全与战略》(徐伟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7、165 页。

③ Andrew Kydd, "The Art of Shaker Modeling: Game Theory and Security Studies," in Sprinz and Wolinsky-Nahmias, eds., *Models, Numbers and Cases: 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348. 谢林作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最早采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威慑理论的学者,因运用博弈论方法在冲突与合作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了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

《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第 1—33 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威慑理论和博弈论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创建的两学术理论^①, 国际安全问题特别是核威慑问题是最早采用博弈论方法进行研究的领域之一。美国战略学界曾对博弈论抱有巨大希望, 甚至有五角大楼分析家认为, “我们希望它起作用, 正如我们在 1942 年希望原子弹起作用一样”^②。战略学家们很快意识到, 美、苏之间的核威慑关系并不是早期博弈论所描述的那种完全对抗的零和博弈, 而是有着极力避免核战争这一共同利益的非零和博弈, 由此催生了后来非常有影响的“囚徒困境”和“胆小鬼游戏”等经典非零和博弈模型。目前建立在“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等均衡概念基础上的主流博弈论方法, 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发展起来的。1986 年巴里·纳莱巴夫 (Barry Nalebuff) 最早采用主流博弈论方法研究威慑问题, 此后以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弗兰克·扎加雷 (Frank Zagare)、詹姆斯·费伦 (James Fearon) 为代表的新一代威慑理论研究普遍采用主流博弈论方法来建立威慑模型。^③ 在此之前, 一些独具特色的非主流博弈分析方法在威慑与冲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元博弈 (Metagames) 方法、基于误博弈 (Hypergames) 的冲突分析方法以及行动理论 (Theory of Moves) 等。^④ 由于元博弈与重复博弈、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行动理论与动态博弈分别类似, 因此上述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因错误的原因而反对主流博弈论。^⑤

① 冯·诺伊曼于 1944 年创建了博弈论, 伯纳德·布罗迪在 1945 年最早提出了核威慑思想, 参见 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6)。

② J. McDonald, “A theory of strategy”, *Fortune*, No. 39, June 1949, p. 100.

③ 参见 Barry Nalebuff, “Brinkmanship and Nuclear Deterrence: The Neutrality of Escal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9, No. 2, 1986, pp. 19—30; Robert Powell, “Nuclear Brinkmanship with Two-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1, 1988, pp. 155—178; Frank Zagare and Marc Kilgour, “Asymmetric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1993, pp. 1—27; James Fearon, “Signaling versu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2, 1994, pp. 236—269。

④ 参见 Niall Fraser and Keith Hipel, *Conflict Analysis: Models and Resolutions* (New York: North-Holland, 1984), pp. 203—220, 235—259; Steven Brams, *Superpower Games: Applying Game Theory to Super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9—62; Steven Brams, *Theory of Mo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3—42。

⑤ Barry O'Neill, “Game theory models of peace and war,” in R. Aumann and S. Hart, eds., *Handbook of Game Theory* (Amsterdam: Elsevier, 1994), Vol. 2, pp. 997—1055。

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方法阐述威慑格局与可信威慑的形成条件,探讨威慑实力、决心与信息传递这三个要素起作用的机理,并结合四个实例进行具体分析。本文采用的假定与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对博弈论的两条基本假定一致:(1) 博弈方是理性的,即国家是追求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2) 博弈方是具有理解力的,即国家之间的互动存在“共同知识”。^①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理性威慑逻辑的三种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威慑格局概念与可信威慑的形成条件;第二部分探讨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慑信号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海湾战争前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策略互动、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跨过“三八线”的威慑、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对苏联的威逼以及马岛战争中英国对阿根廷的威逼四个实例;第四部分是对论文观点的总结。

一、威慑逻辑的一般分析

威慑作为一种使用武力威胁方式慑阻对手以防止出现不希望的结局的国际政治行为,在谋略、战略和理论三个不同层次上得到应用与研究。作为谋略,威慑与战争、贸易、联盟一样历史久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②;作为战略,核威慑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主题与基石^③;作为理论,它是任何威慑战略赖以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原则。^④ 如果说,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威慑是作为实际使用武力之前的一种谋略而存在,在冷战时期威慑战略是威慑研究的核心,那么,冷战结束后威慑理论尤其是威慑逻辑研究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基于将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假定,威慑逻辑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三种,即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和博弈论分析框架。

① 罗杰·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② Claudio Cioffi-Revilla, "Origins and Age of Deterrenc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ld World and New World System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 33, No. 3, August 1999, pp. 256—258.

③ 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④ Patrick M. Mogan, *Deterrence N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

(一) 威慑逻辑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种源于经济学的“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它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逻辑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经济或政治行为就会发生,否则该行为将不会出现。把这样的逻辑应用于威慑行为,其含义是:当战争的收益高于战争成本,即战争是有利可图时,潜在的进攻者将会发动战争,威慑者的威慑失败;否则,它将不会发动战争,威慑者的威慑成功。为此,威慑者将通过传递清晰明确的信息使潜在的进攻者认识到,如果它发起战争将会得不偿失、无利可图,以此慑阻对方可能发起的进攻。

在早期及后来的经典威慑理论中,对于威慑逻辑的探求充满了这样的成本—收益分析思维,认为“威慑概念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在选择战争之前,通常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①。乔治和理查德·斯摩克(Richard Smoke)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给威慑下过一个被广泛引述的经典定义:“就其最一般的形式上,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风险大于收益。”^②在他们之前的早期研究者中,布罗迪(Bernard Brodie)就明确指出:“威慑的实现,是通过让潜在的进攻者确信,蓄意发动大规模核战争的收益,绝不会大于进行这种战争的成本。”^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将使对方认为与其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敢采取某种行动。”^④威慑理论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倡导者保罗·胡思(Paul Huth)在20世纪末的一篇威慑研究综述文章中给威慑下了类似的定义:威慑是指一方通过发出威胁使另一方意识到可能招致的代价和损失,从而克制自己,避免采取某种行动。^⑤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页。

②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3.

③ Bernar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71.

④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2), p. 12.

⑤ Paul K. Huth, "Deterr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1999, p. 26.

上述学者的论述都清晰地反映出成本—收益分析思维。这一思维背后的逻辑是:威慑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使对方相信: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对方进攻所期待的得益;也就是使对方产生这样一个心理效应: $L(\text{损失}) - G(\text{得益}) > 0$ ”^①。

(二) 威慑逻辑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威慑逻辑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认为,潜在进攻者之所以屈从于威慑者的武力威胁,是因为其发起进攻的得益(或期望得益)小于损失(或期望损失),因此得不偿失。如果从决策视角考察,这种分析框架潜在地假定不采取行动的得失为0,因此是否采取行动只需权衡行动本身的利弊得失(大于0即采取行动,否则不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威慑情景中普遍存在理性选择问题,即潜在进攻者需要对采取行动(如发动战争)与不采取行动(不发动战争)两种策略的效用进行比较,而不是简单地将不采取行动的得失默认为零。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差异在于:当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时,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看来,挑战者将不会发动战争;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认为,如果不发动战争情况更糟,则发动战争虽然得不偿失但却是一种占优策略,挑战者将发动战争。

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潜在进攻者采取“进攻”和“不进攻”两种行动时的决策方案进行了比较分析,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对潜在进攻者采取“挑战”和“不挑战”两种行动时的决策方案进行了讨论。^②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引入了对手策略的不确定性,即考虑了威慑者的可能行为对潜在进攻者的影响。理性选择框架的逻辑思路可以简要归纳如下:设潜在进攻者不采取行动的效用为 U_s ,采取行动的效用为 U_c 。由于它采取行动时,威慑者可能采取报复或不报复的回应方式,因此 U_c

① 参见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第17页。

② 参见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6—27;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y: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p. 166。吴纯思对斯奈德和布赞的理性选择分析进行了详细论述,参见吴纯思:《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6页。

是一种期望效用。设当威慑者不报复时(设概率为 p),潜在进攻者效用为 C ;当威慑者实施报复时(其概率为 $1-p$),潜在进攻者效用为 D 。则有: $U_c = p \times C + (1-p) \times D$ 。根据理性选择框架,当 $U_c > U_s$ 时,潜在进攻者采取行动;否则,潜在进攻者不采取行动。设 $p = p^*$ 时有 $U_c = U_s$,可求得 $p^* = (U_s - D)/(C - D)$ 。 p^* 被称为威慑“所需可信度”,即威慑者威慑成功的最低门槛概率。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理性选择分析框架看来,潜在进攻者是否采取行动,既需要对采取行动的代价与收益的大小进行“代价评估”(即评估 C 与 D 的大小),也需要对威慑者兑现其威胁即实施报复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即评估 p 值大小)。也就是说,“在被威慑方的评估系统中,至少有两组四个变数在起作用——代价与收益的大小和兑现与不兑现的可能性。如果被威慑方根据两种评估的总和,决定不采取行动,威慑就奏效;反之,如果被威慑方决定采取行动,威慑则失败”^①。

(三) 威慑逻辑的博弈论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不仅考虑了被威慑者不同策略之间的比较与选择,而且考虑了威慑者在策略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但它并没有考虑威慑者与被威慑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而策略互动正是威慑行为的最根本特征之一。在这一点上,作为交互式决策理论的博弈论分析框架与前两种分析框架区分开来。与成本—收益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相比,博弈论分析框架除了“理性人”假定外还增加了博弈方之间存在“共同知识”的假定。

1. 威慑格局的形成

从策略互动角度看,威慑是一种威慑者与被威慑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博弈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之分。一方面,后行动的一方可以对先行动一方的行为进行观察,然后再选择自己的相应策略或行为,即存在相机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先行动一方由于能够理性地预期到后行动的一方可能采取的策略,因此能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在从策略互动视角对威慑的早期研究中,谢林采用具

^① 姚云竹:《战后美国威慑理论与政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